

近代中国“生育节制”思潮的历史考察

陈文联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面对中国近代人口过庶的社会问题, 以汪士铎的“减民”思想、严复的“奢民说”“教育妨生说”为代表的晚清有识之士开始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20世纪20年代, 新式知识分子主要围绕生育节制的必要性、及其方式进行了探讨, 形成了颇有影响的思潮。30年代, 强调生育节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 将人口理论引入生育节制思想, 并从理论宣传转向实践宣传。40年代, 因国内政局动荡, 其节育思潮式微, 但仍在力求使节育医学专门化、政策化。

关键词: 近代中国; 生育节制; 思潮

中图分类号: C923;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2-0174-07

所谓生育节制, 就是“依据本人遗传的品质、经济的能力和知识的程度三个标准, 用自然或人工的方法, 来限制生育的量数”^{[1](366)}。在漫长的小农经济支配的封建社会里, 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在“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中生活, 都在“努力地制造后代, 不管品质底好不好, 只要数目多, 就以为对得住祖宗”^[2]。这种多育的观念是与中国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进入近代社会, 面对中国近代人口过庶的社会问题, 深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 近代有识之士开始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至五四时期, 生育节制问题成为当时思想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酿成了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到40年代, 这一思潮渐入衰微。本文所要探讨的, 是近代生育节制思潮的演变过程及其特色, 力求从中得出某些启示。

一、近代“生育节制”思潮的萌芽

晚清时期, 面对中国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及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以汪士铎、严复为代表的有识之士, 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反思, 提出颇有特色的人口控制思想。这些思想虽不甚完整, 在社会上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更谈不上什么“思潮”。但是, 这种与传统生育观相悖逆的生

育观念的出现, 无疑是在传统生育观这块冰山上凿出了一角, 迈出了生育观近代化最初的步伐, 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一) 汪士铎的“减民”思想

在近代中国, 汪士铎是最早提出节制生育的。由后人根据汪士铎在1855年至1856年间的笔记和备遗录整理编纂的《乙丙日记》, 集中反映了他的人口思想。书中分析了人口过剩的危害并提出了一系列节制人口的主张。

首先, 汪氏认为“患起人多”, 正是人多导致了社会的动乱, 百姓贫苦, 百病丛生。“今天下之患, 在人满而吏惰。人满故贫, 吏惰故玩……民安其乡不足自存活, 是故强者肆桀骜, 弱者习狡诈, 盗贼滋蔓, 讼狱如荼……故祸变酿为此极而非社会之不善也。”^{[3](16)}把社会动乱的一切都归咎于人口太多, 虽然掩盖了封建专制的罪恶, 当给予批判, 但把人口与社会稳定联系起来, 在社会的政体环境中考量人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二, 面对人口及急剧膨胀与自然资源日益减少这一严峻的形势, 汪士铎积极探索摆脱人口危机的途径, 提出一系列的节制生育的主张, 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后人借鉴, 具体包括: 实施晚婚, 严禁“女子二十五岁以内, 男子三十岁以内嫁娶”^{[3](200)}。后又改为:“戡定三十而娶, 二十五而嫁, 违者斩决”; 推行少孕, 一家只允许有一子或一女, 最多有两子,

收稿日期: 2007-01-25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2003 Z C 50)

作者简介: 陈文联(1967-), 男, 湖南衡阳人,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后,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思想史研究。

而不准两女；力倡避孕，“妇人服冷药生一子后服之”，主张通过“广施不生育之方药”和吃“断胎冷药”，使妇女生一子后勿孕；倡导利用经济政策控制生育，“生三子者倍其赋”，“家有两女者倍其赋”^{[3][P29]}。上述方案，绝大部分均属切实可行的，尤其是他的“少育”、“避孕”“优生”思想实属难能可贵，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不过这些思想主张，只是当时思想天空里的“昙花一现”，并没有辐射和影响到“公众生活”，也没有“强有力的社会集团承载”之，因而它没有“产生强大的社会作用”^{[4](359)}，也没有“汇聚点滴成为江河”和获得制度化的可能；这些孤掌难鸣的“怪诞”言论直到晚清时才开始慢慢被人所知。

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作为新旧交替之际的封建士大夫，在我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之际，汪士铎的人口节制理论，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包含着许多糟粕性的成份。他认识到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却主张用株族、连坐等“减民”方法达到“减其民十之七八，则家给民足，驱之为乱亦顾恋而不愿矣”的目的。他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必须“驰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广设清节堂、童贞女院，怂恿人们出家修行，永伴清灯，“取其不生育而人少也”；借助瘟疫削减人口，“多疫为瑞”^{[3][P20]}。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骇人听闻的“减民”措施，是不人道，也是违反科学规律，甚至是荒诞不经的，因而在实践上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二）严复的“奢民说”和“教育妨生说”

面对中国近代人口过庶的社会问题，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浸润和熏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复，主张用“奢民”和“教育”法来控制人口的增长。这是严复节育思想的最大特色。

严复认为，人群生活水平的差别对人口增殖有不同的影响。在生活水平低的人群中，生活水平的波动对他们的生殖能力的影响不大，只要能度日不死，他们就能够繁殖；而在生活水平高的人群中，由于过惯了优厚的安适生活，他们的生育就会受到限制。他说：“生之量以资生之量为界。然此界群有不同，傻野蠢愚之民，以度日不死、最下之食为界，必至饥馑，其生始屈。文明之群，民习于丰给，则其界略高，不待饥馑，生机已狭。”^{[5](858)}既然生活水平高低不同者对繁殖后代的态度不同，生活水平低者不易控制生育后代，而生活水平高者反易控制生育后代，那么就应当“使民质崇，则过庶不易，

而所患或稀；若民智甚卑，则过庶易成，而所患众矣”^{[5](856)}。根据这样的认识，严复主张用“奢民”（使民富裕）的方法可降低人口增长率；反对用“俭民”（使人民生活贫困）的办法，来限制人口的增长，因为“徒俭菲不足以救之也。”严复主张用提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办法来降低人口的增长率，这既有利于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又有利于提高人口的素质，减少人类自身的生产，确具有相当合理的内核，虽在晚清时期无法付诸实践，但于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严复还认为，提高人类受教育的水平，可以减缓人口增长的速度，提高人口的质量，即所谓“教育妨生说”。在严复看来，教育之所以能取得减缓人口增长速度的效果，一是因为“脑进者成丁迟”，“智下者生多而成丁少，智上者其成弥倍，其生弥珍”^{[5](866)}，人们受了教育，用脑多了，其生殖能力自然就会降低，而成材者却多。二是由于教育能够去掉“宗教之流毒”，打破以“人鬼为宗教”、鼓吹“求庶为第一要义”的封建宗法思想，改变多子多孙多幸福的传统观念。三是教育可以增强人们的事业心，不愿生养过多的子女，以免妨碍自身的发展和对于子女的教育。他以西方和中国为例，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他说：“欧洲有教之民，方其为学不娶，方其执兵不娶，学成业立矣，非岁逾二百磅者不娶。既娶之后，使家非至饶，则所生不愿逾二子女，后且以术止之。盖恐所生或多，则其力不足办教育也。惟中国之事不然，使其饶资，婚嫁常不出十七八，人人以多子孙为莫大之幸福，而无子为天罚。虽然，生子以后，未尝为办教育计深远也，慈者不过多与财耳，而以不教之子，受易得之财，往往挥霍纷纷，为当身之大患。”^{[5](1009)}严复主张通过教育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实行生育的自我控制性，阻止人口的过快增长，这无疑是正确的。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化科学知识，他们的人口生产总是自发生育的；从现实上看，要实行节制，人们如果没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就会碰到许多困难和障碍。严复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高“教育妨生说”，无疑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意义。

由此不难看出，严复的人口节制思想，是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与当时中国人口问题相结合的产

物。这些思想,虽然囿于当时条件未能有效推行,但是,其合理内核是不容置疑的,它对我们今天实行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无疑具有着有益的启示。

二、近代“生育节制”思潮的形成

五四时期,伴随着近代妇女解放思潮的高涨,以及桑格夫人来华及其生育节制理论广泛宣传的影响,生育节制问题成为当时思想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生育节制的重要性及其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形成了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一) 思潮的两大主题

综观五四时期发表的主要文章,不难发现,当时新式知识分子主要是围绕生育节制的必要性及其方法这两方面进行讨论的。

1. 关于生育节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这是当时宣传和讨论最多的问题,五四新式知识分子主要是从正反两方面来阐述的。

首先,从生育过密、人口过剩所带来的危害的角度,阐述实行生育节制的必要性。他们认为,生育过密、人口过剩给社会带来危害是极为严重的。其一,损害广大妇女身心健康。广大妇女的“康健和生命因妊娠过密蒙著可惊的损害”,甚至“因为生育太蕃,子女太多,身体上和经济上都不能支持,情愿拿生命作孤注,以求解除困苦却也不少”^{[6](682)}。其二,影响儿童健康成长。他们认为,生育过密使儿童身体健康往往“因禀赋不全而羸瘠”,“因营养不够而夭殇”,“因教养不周而愚蠢”^[7],甚至会染成恶的习惯,影响儿童正常健康成长。其三,导致家庭失和。在家庭内,除了经常起“堕胎底罪恶”,而且“青年男女有因子女的牵累,终身丧失愉快和幸福”。精神的颓丧、两性间的情绪,也将日渐衰颓,甚至“波及于恋爱方面”^[8]。其四,危及社会稳定。他们认为,人口众多,而生产有限,必将导致“人浮于食地恐慌”,进而“风俗弊”、“盗贼众”,偷抢盗掠,肆意行虐,而民风大败。总之,生育不加节制,小则损害个人的身心健康,大则危及社会的稳定,因而,实行生育节制是势在必然的。

其次,从“产儿制限”所带来的利益的角度,进一步阐述实行生育节制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实行生育节制的意义是重大的。其一,改善儿童养育。他们认为“限制生育,则对于产出之儿童,可以充分抚养,幼孩之死亡减少,可得健全之壮丁”;且“子女教育充分满足”^[9]。其二,促进妇女解放。他们

认为,我国妇女地位“低微已极”;“毕生鞠躬尽瘁,专做那生育儿女的机器”;“第一个小孩还没有断乳,第二个早已受孕了。这样继续着,直到为母的生理作用停止时为止。中间除了妊娠、分娩、保抱、提携、乳哺、衣食种种的麻烦以外,还有疾病的忧愁,夭殇的悲戚,不但受尽了身体上无限的辛勤,更受尽了种种精神上说不尽的苦痛”。这样下去,“哪有受教育的机会、服务社会的余裕、经济独立的可能”^[10]?所以,如果要“图谋完全的妇女的解放,一方面固应该使女子取得社会上平等的待遇,和恋爱及婚姻的自由,一方面尤须使女子有母性的选择权”,否则,“女子究竟不免做男子的奴隶”^[13]。从“母性选择权”和妇女解放的角度,来论述生育节制的重要意义,确是新颖、独到,也较有说服力。其三,预防社会疾病,增进社会文明。他们认为,若限制生育,则可以缓和经济之困难,产生健全之儿童,从而可以减少或消灭“娼妓、畸形儿、不良犯罪者、贫民乞丐等”种种不幸现象^{[12](56)}。不仅如此,实行生育节制,还有利于提高种族的文化程度,即“教育可期彻底之普及。一般社会之程度,自然增进”^{[12](56)}。甚至有人把生育节制视为“文明进化的特征和要素”^{[13](54)}。将生育节制问题上升到社会文明增进的高度,是较为深刻,也富有感染力。

2. 关于“生育节制”的途径与方法

这是20年代“生育节制”思潮的重要部分。生育节制的倡导者,遵循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主张“用科学的方法,使做母亲的有决定产生子女数目的自由,而不必再用那堕胎、弃儿、杀婴等残酷的非人道的手段”^[10],来达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具体的方法有包括:“①安全期法。即用女性生理上的安全期,来避免生育。②X光断种法。即‘用X光放射男女生殖器,使种子变弱,以后虽仍有色欲的能力,而无生育的能力’。③外科手术法。即通过外科手术来切割男子的精囊或女子的卵巢,使男子或女子不能生育。④男女双方机械制育法。”^[11]这四种方法乃是当时宣传生育节制的主要方法。

不难看出,五四新式知识分子对生育节制的论述,既全面又前卫,它对于进一步解放人们思想、拓宽人们视野、推动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具有着积极作用,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独有的思想活力和积极的探索精神。

(二) 思潮的两大特色

五四时期生育节制思想,无疑是晚清时期这一思想的延续与发展,但与后者相比较,却有着两方面的鲜明特点。

其一，社会基础更为广泛。如果说晚清时期呼吁节制生育的仅是少数几人呐喊，那么到五四时期这支队伍已经扩展到一大批知识分子群体身上。他们当中既包括名闻遐迩的鸿儒硕学，也包括一些其名不扬的进步青年。一时间，国内知识界、舆论界纷纷撰写文章，发表言论参与了“生育节制”的大讨论，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潮。《民国日报·妇女评论》《学灯》《妇女杂志》《家庭研究》等刊物都辟有“生育节制”问题专号，《生育节制法》《生育节制论》《节制生育问题》《节育实施》《产儿制限ABC》等著作也相继问世。象这样大规模地、有目的地并从近代科学意义上全面阐述节育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提及五四时期生育节制思潮的形成，就不能不谈到桑格夫人来华。桑格夫人是美国著名节育运动创始人、生育节制的理论家，1922年3月赴伦敦参加第五次国际生育节制大会，途径中国，于4月到北京，后转上海。在北京、上海停留期间，桑格夫人到处讲演，传播西方生育节制理论和方法。其讲演经过翻译、整理，在《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以及《妇女杂志》《妇女声》《解放画报》等颇有影响的刊物发表，受到了新式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其中，桑格夫人在北京大学所作的《生育节制底什么与怎样》的讲演，由国内知名学者胡适任翻译，张竞生作陪，影响甚大。北大三院听讲人很多，“四壁有站着的、窗口上有爬着的，甚至把的窗户桌儿都要挤坏了”^[12]，热烈之盛况，可以想见。在讲演中，她不仅向中国听众讲述了节育的意义，还用较多的时间详述了男女性生理，向中国听众详细传授了在中国实施“生育节制”的具体办法。在这样公开场合，具体地长时间的讲到生育节制和性，是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之事。如此公开宣讲节育，自然引起了国人对生育节制问题的特别关注，无疑将中国节育活动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二，思想更为完整、深刻。如果说辛亥前后生育节制思想还不能说完全做到系统、全面而又深刻，那么，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却可谓做到了这一点。这种深刻性，不仅体现在先进知识分子对生育节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途径与方法作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刻的论证，还集中体现他们把生育节制问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主题——“人的解放”联系起来。这对开启人们觉醒，使之理解生育节制本质，无疑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五四先进分子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将生育节制上升到妇女解

放、人的解放的前提之一这样一个高度。他们认为，在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影响下，“我国妇女，真可说是低微已极了”，她们仅仅是家庭繁殖的工具，她们的“康健和生命因妊娠过密蒙受着可惊的伤害”。因此，要使广大女性从“低微已极”中解放出来，让她们能享受平等的教育、走出社会，就必须节制生育。所以，“产儿制限与妇女解放的前途，更有非常重大的关系”^[10]。将生育节制问题与妇女解放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既有说服力、号召力，同时又深化了对五四妇女问题的认识，有利于妇女解放的深入发展。

总之，与晚清时期相比较，五四的生育节制思想，不论其思想的广度，抑或其深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反映了人们对时代主题的新思考、新选择，以及人们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和在世界新思潮的影响下，价值取向的新确定。显然，这些对当时及其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近代生育节制思潮的发展

进入30年代，优生节育思潮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丰富，生育节制倡导者们不仅对优生节育与国家社会之间的认识有了升华和提高，在具体的实践上也更为成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1. 强调生育节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

20年代生育节制作为一种先进的生育观，被赋予了过多的神秘色彩，甚至被夸大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方，只是一味地追求节制生产、降低出生率，而没有将优生节育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到30年代，这种状况有了改观。

优生节育作为一种进步的生育观，它的出现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多子多福”生育观之所以根深蒂固，其重要原因就是国人出于养儿防老的考虑。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台，民众很难将这一新的生育观付诸实践。对此，节育倡导者们主张建设相关的福利设施，“普遍地实施老年恤金制度或设立老人院，庶免‘养儿防老’地顾虑，和解除老年无依的寂苦”^[13]。把生育节制运动的推行与社会制度的安排放在一起考虑，是很深刻的，这是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有利于推进生育节制实践活动的开展。

2. 将人口理论引入生育节制思想

20年代先进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强国强种、女性解放、儿童健康等视角来认识生育节育的，当时

很少有人将生育节制与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统筹考虑。到了30年代,这一情形有了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口学家开始关注优生节育问题,并将优生节育与社会人口之间的关系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来。

陈长蘅为现代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先行者,在其代表作《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193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提出适度人口论及“生育革命和淑种运动”的政策主张。他认为,“一个国家民族要想永远存于世界,但要靠人口数量的优越,更要靠人民品质的优越”,“时中(即适中)的人口密度为提高人生标准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国家要“欲提高国际地位、人民程度和人生的价值,欲增进人民的福利、种族的健全和社会的安康,……我们不但不要再去鼓励多生,而且还希望大家努力去灌输西方诸国调剂人口和改良种族的各种健全学理和健全方法”。他强调要用“‘节育’与‘优生’两个‘并蒂连理’”的方法来控制人口的出生率,以维持最适合社会状况的人口密度,为个人发展、种族的改良创造良好的环境。陈达在其专著《人口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中强调,中国要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最有效的办法,实恃节育的推广”。人口学家纷纷加入生育节制的研讨,无疑有利于生育节制运动进一步深入与发展。

3. 从理论宣传转向实践宣传

30年代节育运动开始由理论宣传逐渐走向实践,其标志是1932年2月原北平妇婴保健会的成立。

北平妇婴保健会会员包括有医生护士、公共卫生员、社会服务者和社会学家等,如杨崇瑞、晏阳初、周励秋、许士廉、陈达、袁贻瑾、雷洁琼等。“该会所订节育条件凡有节育需要之已婚者,始可请求节育。即征求节育方法者,必须适合以下的某一条件:(1)受经济压迫;(2)身体疾病健康不良;(3)遗传有欠缺。”^{[12](60)}该会成立后,在《北平晨报》出刊《人口副刊》,每月第一星期日发表;并在《北平实报》出刊《节育讯》,每月十八日发表;1934年在《北平全民报》出刊《节育须知》,每月二十五日发表;此外还刊发节育传单,“以‘节制生育’,‘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品质’为标题,并将该会节育指导所的工作,标准手续,方法,费用,出版品,各项提要摘录,并唤醒节育者对于节育应行注意之点。”^{[12](60)}该会工作三年以来取得了部分成绩,其一,“了解节育意义和同情生育节制的人,现已逐渐增多”;其二,“下层阶级的节育人数逐渐增加”;其三,“该会所采用的节育方法渐有进步,用费亦渐减

低”;其四,“该会已于北平市社会局立案”,获得法律地位^{[12](60)}。北平妇婴保健会的成立,使我国节育实践指导逐渐发端。自1930年至1934年,该所共施行节育547例。节育运动在知识分子中已有渐渐普及之势。显然,30年代以后,以北平妇婴保健会为代表的各类节育指导所的成立,有力促进了节育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推广。

四、近代“生育节制”思潮的衰微

进入20世纪40年代,受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近代节育思潮开始逐渐走向衰微。不过,有一批仁人志士对节育的热情依然不减,仍然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继续探索和实践着,力求使节育医学专门化、政策化。这是该时期节育思潮的重要特色。

一是努力将“节育”医学专门化。医学工作者是四十年代节育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从医学的角度出发,主张将“节育”医学专门化,并取得了一些成绩。1942年,上海妇孺医院沈骥英医师,在“节制生育的临床工作报告”中,通过自己在节育工作中的实践以及对1800户家庭的调查,统计了受孕的次数、各种工具避孕的失败率,呼吁医务人员重视节制生育的宣传与研究,倡导医学院开设有关“节育”课程。1947年,医学博士郭清泉出版专著《实用避孕法》。该书在全面详细介绍各种科学节育方法的同时,强调医务人员应该承担起节育方法的“管制”任务,对节育需求者进行科学的指导。

二是努力将“节育”政策化、规范化。多年来的“节育”宣传,一直只是停留在民间和部分人的活动,并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参与。进入四十年代,在推进政府加入节育运动方面,有了少许转变。

“1941年秋国民政府社会部(当时主管制定人口政策的机关)出面组织了一个研究人口政策的委员会,邀请当时各大学教授专家及政府部门中对人口政策有兴趣的人参加。委员有陈长蘅、陈达、孙本文、许世瑾、潘光旦、张鸿钧等,基本囊括了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人口学家。”^[13]抗战期间,这个委员会在昆明和重庆举行过几次会议,并对人口数量、人口品质、婚姻家庭及移民运动等问题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制定多项重要议案,“主张国家在大多数人民还处在普遍贫穷、愚昧及生活程度低下的状况下,不应该也不能够鼓励无条件及普遍的增加人口,应积极推

进人口品质研究和优生学的探讨”^[13]。至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承认“优生节育”的合法地位。“节育”合法性的承认，无疑有利于节育实践活动的开展。非常遗憾的是，国民党政府未能制定相关政策，在全国推行节育运动。至此，节育思潮也渐渐衰微。

五、余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优生节制的急切呼唤，对近代化的孜孜追求，也为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留下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可贵的历史经验。

一是生育观的现代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列宁曾深刻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14](25)}。“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生育观，经过数千年历史的积淀，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它不仅使广大妇女“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还导致了中国人口量大而质不高，进而制约着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更新传统生育观，重新构建一个新型的生育文化，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有基于此，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以西方生育节制学说为理论模式，不仅从女性解放、儿童成长、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近代中国推行生育节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还全面介绍了优生节制的途径与方法，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以重新构建一套科学的有效的生育理论体系。显然，这一切是对传统生育观的颠覆与背叛，它对于更新传统生育观念、促进人的解放尤其是女性解放、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这种业已根深蒂固、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和滞后性的传统生育文化，并非短时期内用一二次、三四次斗争就能彻底瓦解和清扫。实现生育文化现代化，也是一场艰巨而又深刻的革命。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传统生育观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渗透力。因此，坚持不懈地在全社会开展生育节制活动，理应成为一件长时期的艰巨工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旦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5](19)}这就是说，要发挥科学理论

的作用，要用科学的生育观武装公众的头脑，改变全社会观念，提高全社会的鉴别力和思想意识，促进生育文化的现代化。

二是生育观的现代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由各国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成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6](644)}传统“多生多育”生育观之所以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其根本原因，乃是以中国封建小农经济“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女权思想的输入，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生育观开始在先进知识分子产生、发展。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这种现存的经济基础也决定了传统生育观依然根深蒂固，广大国民仍不能摆脱传统生育观的束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现代化生育观是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相依存的。只要传统生育观赖以依存的小农经济不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传统生育观就无法实现现代化。所以，要实现生育观的现代化，单靠“计划生育”这样的诱导式转变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快传统经济现代化进程和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进而促使广大民众在新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现代经济条件下的新生育观。惟其如此，方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

参考文献：

- [1] 麦惠庭. 中国家族改造问题[A]. 民国丛书: 第2编第19册[C].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
- [2] 丐尊. 生育节制[J]. 妇女评论, 1923, (38).
- [3] 汪士铎. 乙丙日记(卷二)[M]. 明斋丛刻, 1935年铅印本.
- [4] 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359.
- [5] 严复. 严复集(第4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6] 邵力子. 邵力子文集(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7] 桑格夫人, 平沙. 生育节制底重要和方法[J]. 妇女评论, 1922, (39).
- [8] 陈德征. 生育节制和恋爱[J]. 妇女评论, 1922, (40).
- [9] 邵飘萍. 避孕问题之研究[J]. 妇女杂志, 1920, (5).
- [10] 瑟庐. 产儿制限与中国[J]. 妇女杂志, 1922, 8(16):
- [11] 桑格夫人. 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N]. 晨报副刊, 1922-04-15.
- [12] 中国经济年鉴[Z].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 [13] 龚书铎, 史革新, 朱汉国. 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14] 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A]. 列宁全集(第3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6] 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Gradual progress and inspiration of birth control ideological trend in modern China

CHEN Wenlia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over-population problem in China in last fifteen decades, some wise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 assertion of restriction of birth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uch as Wang Shiduo's thought of depopulation, Yan Fu's thought of upgrad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to control population and his another thought of upgrading people's level of education to control population. In the 1920s, new intellectuals philosophized about the necessity and ways of restricting birth and formed quite an influential train of thought. In the 1930s,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restriction of bir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as stressed and population theory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thought of restriction of birth and it had a change from academic propaganda to practical propaganda. In 1940s, due to the volatil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the train of thought of restriction of birth seemed quite puny and weak, yet it made an effort to make the medicine of restriction of birth specialize and a policy.

Key word: Modern China; Birth control; Ideological trend

[编辑: 颜关明]

(上接 154 页)

注释:

- ① 此篇文章为夏斌所长在首届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中所做的专题报告, 该文对现今乃至将来信托与信托业发展具有非常重大之指导意义。
- ② 有关法规规定, 行政部门许可制度标准的提法有三种: 审批、核准与备案。

参考文献:

- [1] 夏斌. 规范财产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颁布之际[J]. 中国金融, 2001, (6): 13-16.
- [2] 夏斌. 委托理财: 政出多门必须结束[N]. 财经时报, 2003-05-24.

Two major problems of developing uniform trust market in China

XIA Bi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State Council P.R.China,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serious problems in the supervising system of trusts and finances market in China and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and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should take some measures to unify the supervising policy. The mode of supervising trust companies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supervising banks, which mainly manifests with two aspects: for one thing, to supervise the trust so that activities of the financial organs can faithfully follow the fabric factors of the trust document; for another, to supervise the trustee so that they will veritably fulfill the trust contract.

Key words: trust; trust company; supervision

[编辑: 苏慧]